

提问诸子丛书

黄坤明 主编

传统精髓·现代表达

郭志坤 陈雪良 著

孤愤著书
以法为本

提问韩非子



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
若隐若现地影响着
中国的社会，
撞击着数代人的心灵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提问诸子丛书 黄坤明 主编

提问韩非子

孤愤著书
以法为本

郭志坤 陈雪良 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提问韩非子/郭志坤,陈雪良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7

(提问诸子丛书/黄坤明主编)

ISBN 978-7-208-14253-4

I. ①提… II. ①郭… ②陈… III. ①韩非(前280-前233) — 人物研究 IV. ①B226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03135号

出版统筹 孙 瑜
责任编辑 范 晶
装帧设计 范昊如

· 提问诸子丛书 ·

黄坤明 主编

提 问 韩 非 子

郭志坤 陈雪良 著

世 纪 出 版 集 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9.75 插页 4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4253-4/B·1234

定价 58.00元

总 序

黄坤明

读诸子百家书，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：善于提问。“孔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(yì)》）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。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，提问频率之高，问题触及面之广，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：都说孔子知礼，怎么还提问不断呢？面对发问，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：“是礼也！”其意是讲，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，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！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。“三十而立”后的数十年间，无论是教学弟子，还是答问友朋，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，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。在诸子中，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，用司马迁的话说，是“学者宗之”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，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。

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，它会使人兴奋，使人坐卧不安，使人有索解的欲望，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。一个问题解决了，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。任何一个人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。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，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“永动机”。

我们常说，理论始于问题，科学始于问题，我们又何尝不可说，学习始于问题呢？

我们常说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，其价值也往往更大。善于提问，敢于提问，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。

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，孔子等先哲倡导的

“提问”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。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。为何不把先哲请到“前台”进行访谈呢？他们的身世如何？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？为了传播学说，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？说是学习，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？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“书本”？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？……甚至他们穿的服饰、吃的食品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、有滋有味的问题。

有鉴于此，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“提问诸子丛书”。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、通俗流畅的语言、富含哲理的剖析、见解独特的解说、图文并茂的装帧、考之有据的典章、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。

2010年春于杭州

提问韩非子

前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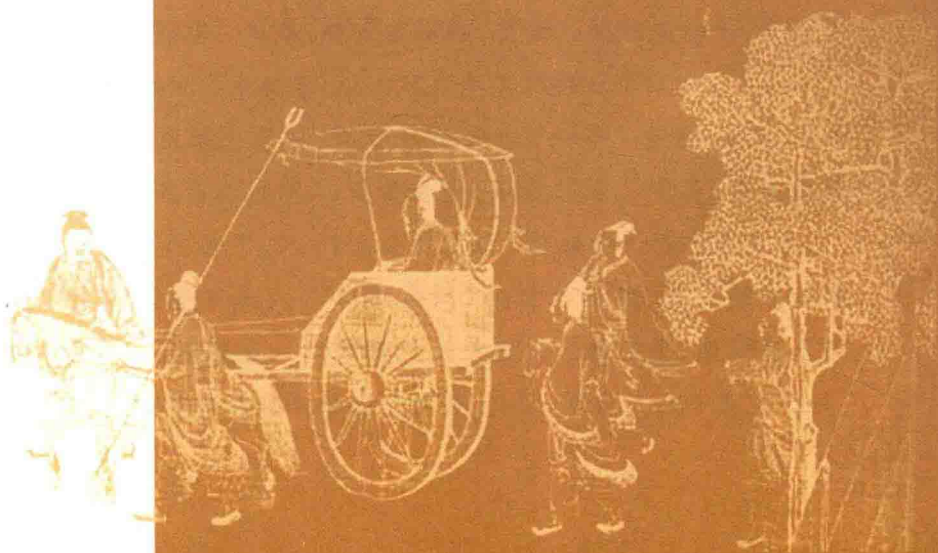
韩非子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大家。他不只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他也是儒、道、法、墨诸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他采诸子百家学说之精华，构建起了法、术、势一体的中央集权、君主独裁政治体制的框架，为秦帝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。

毋庸讳言，韩非子不是一个政治实践家，他甚至没有当过一天官，理过一天政。他始终是一介书生。他只是凭借着自己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素养，凭借着孤臣孽子对时局的特殊感悟，凭借着一腔冲天的孤愤之情，为“明天”的政治进行了大胆的勾勒和设计。他要打碎那个“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，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，轻禄重身谓之君子，枉法曲亲谓之有行”（《韩非子·八说》）的现实世界。他憎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。这是一个一切都颠倒了的世界。他要把这样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。他知道，他那样做会有多大的风险，他在自己的文稿中一再提到“伏王尸”而死的吴起和车裂而亡的商鞅。他知道得很清楚，那可能就是自己的前车之鉴和最终归宿。可是，他没有退缩，凭着一腔书生意气，义无反顾，一意孤行。最后他受妒被害，被毒死在秦王朝的云阳狱中。

在《韩非子·五蠹》篇中，韩非悠悠然以“新圣”自喻，而在其身后又有人斥骂他“乱圣人之道”，反差之大，绝无仅有。可是，历史是最公正的。两千多年过去了，人们惊异地发现，韩非的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“治吏不治民”“以刑去刑”的法治思想，总是若隐若现地影响着中国社会，像鼓点一样频频撞击着数代人的心灵，激励着人们为创建公平、合理、美好的法制社会而不倦奋斗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韩非子是永生的。

目 录

总 序	1
前 言	1
第一章 孤愤著书	1
第二章 高扬君权	38
第三章 以法为本	63
第四章 处势操术	87
第五章 熔铸百家	117
第六章 战国新圣	137
后 记	147



第一章

孤愤著书

读《韩非子》，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一个“孤”字和一个“愤”字。韩非立志“一天下”，却偏偏处身在“应天下四击，主辱臣苦”，根本无力成就统一大业的韩国；韩非虽身为“韩之诸公子”，却只是个孤臣孽子，与那些幸臣嫡子比较起来，远离君父，欲见面而不得，屡上书而无复，饱尝冷落和欺凌之苦；韩非期盼着“明于圣人之术，而不苟于世俗之言”的人主的出现，而他面对的却是轻信于那些居心叵测的重臣的昏君和庸主；韩非希望寻找到“审于是非之实，察于治乱之情”的智法之士，能一道勇猛前行，共同奋斗，可是，“人皆寐”“皆默”，到哪里去寻找实施“以法治国”的同道呢？“畸致乏援”的他只能独自奋争，独自盘桓，独自前行。

在孤独中，在愤恨中，他不得不求助于手中的那支笔。写啊写，他要以冷峻的笔墨，写出人世的真情；他要以法术家的敏锐，道出国家的衰亡之因和兴盛之本；他要以自己的一腔热血，书写人世间最华美的法治篇章。

这就是历史上曾经存在并永远活在人们心头的那个韩非子。

凡为人立传，或想知人论世，总得弄清楚“某某，某年某月生，某年某月死”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吧！先生，在讨论其他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之前，您能告诉我们您较为确切的生卒年月吗？记述您的生平事迹的资料并不是很多，您能告诉我们，哪些是最靠得住的吗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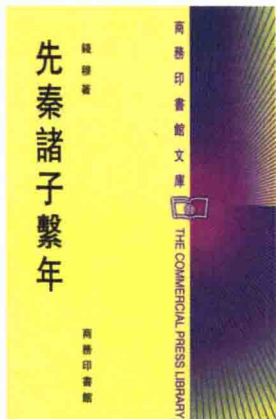
韩非：对不起，实在不能。你们说的先秦诸子，其中除了一两人有明确的生卒年月记载外，诸

司马迁像

子中大多数的生卒年月只能是个约数，甚至时过两千多年，后人还在那里为有些人的生卒年月喋喋不休地争讼不已呢！在我看来，对生卒年月，还是模糊一些的好，只要大致上有个年代的概念，道出其生命存在的背景就可以了。

关于我生平的材料，人们依据的基本上是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提供的一些素材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距我生存的年代只有一百多年，司马迁手中可能有一些现成的文字资料，就算凭的是传闻，也是比较可靠的。《史记》中说，韩王安五年（秦王政十三年，即公元前234年），秦兵大军压境，我受韩王安重托，出使秦国，谋求和解。这是我人生行事中的一个最确定无疑的年份。但是，单有这个年份还是定不了我的生卒年岁。大凡史学家就把我年龄的考证与李斯捆绑在一起，因为《史记》上说我与李斯曾同学于荀子门下，同学而同岁，那是比较靠谱的事。李斯的入秦，在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有明确的记载，当时“会庄

襄王卒，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”，据此，钱穆先生在《先秦诸子系年·李斯韩非考》中得出结论：“韩非与李斯同学于荀卿，其使秦在韩王安五年，翌年见杀，时斯在秦已十五年。若韩李年略相当，则（韩）非寿当在四十岁五十岁之间。”这一寿数往上推，就是我的生年了。钱穆先生把我的生年定在公元前280年，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。



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书影（商务印书馆出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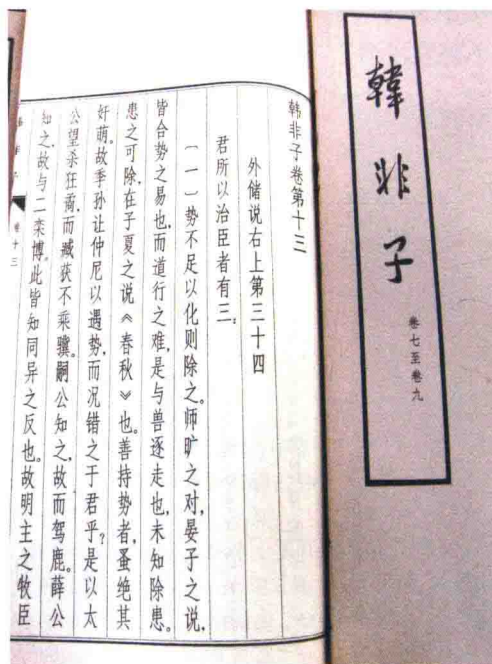


钱穆像

说钱穆的考证或者说是推论得到大多数学人的认可，那是可以的，但在我们看来还谈不上是“一致认可”。有位名叫陈千钧的学者就并不认可钱氏的说法。他直接采集您自己提供的资料，说您应该生于公元前295年，即比钱氏的说法推前了十五年。对此，您有何看法？

韩非：的确，陈千钧先生的考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我也去找来看了，文稿刊在1935年7月出版的《学术世界》1卷2期上。其根据是《韩非子·问田》中有堂谿公与相关人员的一段对话，对此韩非作了实录。韩非既能听到堂谿公与别人之间的对话，又能作出实录，那么韩非与堂谿公当然是并世无疑了。而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中又有堂谿公与韩昭侯的答问。既能答问，二人也是并世无疑的了。韩昭侯于公元前362年到前333年在位，

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书影



假设公元前333年时堂谿公还是个二三十岁的青年，则与我交谈时已是九十余岁高龄了。当时如果我是二十余岁的话，那我的年岁当较长于李斯了，按陈千钧的推断，我当生于公元前295年，到被人暗害而死的时候，应有六十多岁。

我看陈千钧先生的立论和推断都还是不错的，可与钱氏的说法并存。录以备考，最后可以让历史来做出更确切的结论。

讨论了您的出生年代后，我们很了解一下您出身的家庭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写道：“韩非者，韩之诸公子也。”（《老子韩非列传》）我们都知道，国君之子谓“公子”。公子就是公子，太史公为何要说是“诸公子”呢？



韩非：所谓“诸公子”之“诸”，照字面讲就是“众”，也就是众多韩姓同宗公子中的一个。但实际上，一般被称为“诸公子”的，都是地位相当低贱的公子。蔡元培先生在《中国伦理学史》中，说我是“韩之庶公子”，把《史记》上的“诸”衍成了“庶”，实在是颇具深意的。中国历代的帝王国君，都明目张胆地实行多妻制，除原配夫人外，还有众多的后宫妃子。这样，帝王国君的子女，就以数十、数百计，其“诸公子”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则是“庶公子”。庶公子的地位是不能与正室生养的嫡公子相比的。

《史记》书影



蔡元培像

蔡元培，近代民主革命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。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，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，革新北大，开“学术”与“自由”之风；1920年至1930年，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。



《中国伦理学史》书影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）

蔡元培所著《中国伦理学史》书中说：韩非集儒、道、法三家之成，以法治主义为中坚，袭商君而益详其条理。韩非“实商君之嫡系”。



情况似乎还是很复杂的，说身为“庶公子”一定地位卑微，也未必。庶公子相对正宫所生的公子包括太子来说是弱势，那是不待言的。但比起非王室公子来，尤其比起普通百姓来，那就相当强势了。他们要在国君那里谋点什么私利，不是很容易的事吗？这方面您总是有所感受的吧？

韩非：我太有感受了。那些祸国殃民的坏事，

十件倒有七八件是那些公子哥儿们干的。我写的《八奸》一篇，揭露的八类奸行，当头第一种就是“同床”。“何谓同床？曰：贵夫人，爱孺子，便僻好色，此人主之所惑也。托于燕处之虞，乘醉饱之时，而求其所欲，此必听之术也。”那些受到国君宠幸的夫人，趁国君在后宫享乐，酒醉饭饱之余，求得她们所需要的东西，尤其是为自己喜爱的“孺子”谋取特权。我所列的“八奸”中，其他七奸都或多或少地与“同床”有关。庶公子们迷恋于“金玉玩好”，“外为之行不法”，把韩国糟蹋得不成样子了。要这些人干点有益于民众的好事他们干不了，可干“奸事”他们太在行了。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历来有“英雄难过美人关”的说法，那些国君也是难过“美人关”的啊！我的《八奸》篇，其实说的就是韩国的实际情况。我生在韩国宫廷之中，对宫廷中事看得最多，了解得最深。庶公子们的腐败，是韩国整个王室，乃至整个国家腐败的一个缩影。

《韩非子·八奸》书影

篇中的“奸”特指对专制君主的权力构成威胁的政治阴谋，其中包括同床、在旁、父兄、养殃、民萌、流行、威强、四方等八种方式，并分别提出了防范措施，体现了韩非对官场斗争的敏锐洞察力和高度概括力。



刘向像及《说苑》书影

刘向，西汉经学家、文学家、目录学家，曾领校秘书。《说苑》是他校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，按先秦至西汉的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所辑，并夹有作者的议论，带有一定的哲理性。书中涉及商鞅、韩非等法家的身世。



那么，是不是所有的诸公子都那样的腐败，那样的不争气呢？是不是所有的“侧室公子”都能成为“人主之所亲爱者”呢？具体地说，您作为韩王室的诸公子中的一员，是否也是那样的不成气候呢？



韩非：如果我也是那样的一个公子哥儿，我就不会写《八奸》那样的文章去警示韩王了。只有那些“人主未命而唯唯，未使而诺诺，先意承旨，观貌察色，以先主心”的“侧室公子”，才会受到人主的特别青睐和看重。我的母亲不是那样的“同床者”，我也不是那样的“孺子”。从《八奸》一文可见，我的个性是那样的耿直，我的文辞是那样的犀利，我的批评直指众多的“侧室公子”，实际上也直指昏庸的韩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可能指望韩王会宠爱我呢？

明人王道焜在《重刻韩非子序》中说：韩（非）“为疎属公子，畸致乏援”。虽只有短短八个字，却把我的生活境况描绘得十分深刻。“疎”通“疏”，可释为不亲近，那说的是我与韩王之间的关系。“畸致”，是说我韩非行为特立独行，不同流俗，相当于《庄子》一书中说的“畸人”。既然是那样的人，到头来当然是“乏援”了。不只韩王不会伸出援助之手，被我在文稿中骂得狗血喷头的那些“侧室公子”也不会伸出援助之手，就是那些达官贵人、王公巨富，都不会伸出援助之手。正如清人王先谦说的：“韩子宗属疏远，不得进用。”我是个在王室什么地位都没有的人。

我韩非的这种既是所谓的“诸公子”，又毫无地位，还被主政的韩王疏远的人生处境，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王先谦像

王先谦，清末史学家、经学家、训诂学家，曾校刻《皇清经解续编》，并编有《汉书补注》《后汉书集解》《荀子集解》《庄子集解》《续古文辞类纂》等。他作了一番考证后，认为韩非为韩王室疏远宗属者。



《荀子集解》及《后汉书集解》书影

记得孟子在《尽心上》篇中说：“人之有德慧术知者，恒存乎疢疾。独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虑患也深，故达。”孟子这话不是针对哪个个体说的，他指的是一种群体的社会现象。说您是孤臣孽子，是最适宜的。孤臣，孤立无助的远臣；孽子，贱妾所生的庶子。您不正是这样一个人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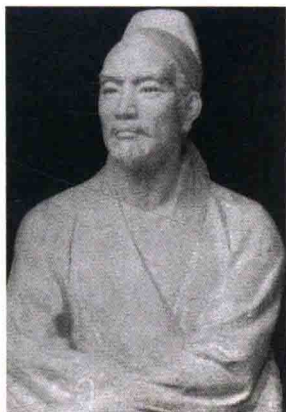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孟子·尽心上》书影

韩非：是的，应该说，我是属于孟子说的那种“孤臣孽子”。我是王室孽子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太多太多，因之“其虑患也深”。我是不受韩君喜欢的远臣，我对韩君是既恨又爱，我眷恋申不害助韩昭侯变革的那个时代，“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”，那时的韩国是那样的风光。人们读了我的《韩非子》一书，将我俩合称为“申韩”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与申不害在“其操心也危”这点上，是完全一致的。不知大家是否记得宋代大诗人陆游在《秋雨叹》一诗中说的那两句诗：“志士仁人万行泪，孤臣孽子无穷忧。”有人认为这里的“志士仁人”，就是指我韩非。读了我的《韩非子》一书，也许谁都会这样联想，会被我的那种为君忧、为民忧、为国忧、为天下忧的忧愤之情所感动吧！

陆游纪念馆及陆游像

陆游，南宋诗人。少年时即受家庭中爱国思想熏陶，高宗时应礼部试，为秦桧所黜。晚年退居家乡，但收复中原信念始终不渝。创作诗歌多为抒发抱负，反映疾苦，风格雄浑，著有《剑南诗稿》《渭南文集》《南唐书》等。



学界有人认为，先秦时期那些汲汲乎投身于变法事业，甚至最后为变法事业献出自己最可宝贵的生命的法家人物，大都是些“孤臣孽子”。请问，这是事实吗？



韩非：说先秦的法家人物大都本身是“孤臣孽子”，那是事实。就说法家先驱人物子产，他出生于郑国的没落贵族之家，是郑公室的孽子。郑国由春秋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逐渐沦为大国附庸的过程，作为“孤臣孽子”的他是极为清楚的。他深信只有变法“才足以救世”。鼎鼎大名的法家人物商鞅，史书上明确说是“卫之诸庶孽公子”。卫鞅在世时，卫国已十分弱小，实际上已沦为韩、赵、魏三国的附庸。母国的卑贱地位，列国间的战乱不已，使他更急切地感受到法治的重要性。一旦秦孝公发出“召贤令”，商鞅马上当仁不让地投身于变法大业了。至于我韩非，更是个典型“孤臣孽子”。因此，看来研究法家人物与“孤臣孽子”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。

子产像

子产，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，在郑国为相数十年，他执政期间在改革上颇多建树，被清朝的王源推许为“春秋第一人”。



《群书治要》书影

申不害，亦称申子，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，以“术”著称于世。申不害在韩为相十五年，使韩国走向国富兵强。其著作《申子》已失传，只看到他人引用的零章断句，比较完整的有《群书治要》卷三六所引《大体篇》。



陈启天像

陈启天，现代学者，著有《张居正评传》《商鞅评传》《中国法家概论》《韩非子校释》等，他认为韩非的品格可浓缩为八字：远见明察，强毅劲直。



《增订韩非子校释》书影

陈启天认为，韩非确是一个“远见明察，强毅劲直”的法术之士。他之所以能集法家大成者，在此特点；他之所以不能见用于宗国者，在此特点；他之所以能不避艰难，奉命使秦者，在此特点；他之所以能不辱使命，终于殉国者，也在此特点。（陈启天《韩非的生平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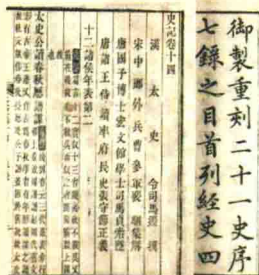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清代学者王先谦说过：“韩非烛弊深切。”（《韩非子集解序》）他是说您对社会的积弊洞若观火，看得既深又切。现代学者陈启天也认为您“远见明察，强毅劲直”。我们想问的是，您对战国时期韩国，以及山东六国的积弊看得那样清楚，与您的“孤臣孽子”身世有关吗？

韩非：我认为，像我这样的一大批“孤臣孽子”，会不约而同地站到变法大业的前台来，那有其历史的必然性。不是“孽子”，不备尝世态炎凉，就不会想要那样急切地去变革现状。不是“孤臣”，如果养尊处优，与昏庸的人主一起“以金玉玩好为乐”，也不会深切地感受危亡近在眼前，这就是所谓“当局者迷”。“孤臣”又称“远臣”，他们与当局的“近臣”保持着一段距离。贵族家世使他们从小受过较好的教育，生活上又能洁俭自律，思想上敏锐锐利，看得远，看得透，看得深。他们不在权力和政治漩涡的中心，他们较少生怕失去既得利益的患得患失之心，他们深深感受到了家国危亡的祸害。正如王先谦说的，我“韩非烛弊深切”。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思想优势所在，可以说也是所有孤臣孽子的优势所在。记得鲁迅先生说过，因为自己从旧垒中走来，反戈一击，就更为有力。“孤臣孽子”也是从王室这个“旧垒”中走来的，因此对王室中的种种阴暗龌龊、钩心斗角、腐化堕落，看得特别清楚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烛弊深切”“远见明察，强毅劲直”，而反戈一击、揭露问题的时候，当然特别能击中要害了。

在太史公为先生作的短短不足四百字的传记中，专门写上了“非为人口吃，不能道说，而善著书”数语。有些学者，把“为人口吃”理解为的一种生理缺陷。有的学者甚至作了这样的演绎和推理，说什么“正因为口吃，因此只得求之于笔墨写文章了”。这样理解准确吗？

韩非：这样的理解显然是肤浅的，甚至是望文生义的。请注意：太史公说的是“非为人口吃”，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，“口吃”不是一种生理状态，而是与“非为人”紧相关联的。太史公要说的是：在当时条件下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，“口说无凭”，人们常常为了一己之私利，曲解别人的意思。为防止别人的无中生有，或恶意曲解，我韩非说话十分小心，在公众场合常常“为人口吃”。这是一种极为严谨的为人处世的风格。正像我在说到法时，一再强调“法者，编著之图籍，设之于官府”（《韩非子·难三》）一样。法要见之于文字才精确，作为一个变法者，哪能“哗啦哗啦”地到处乱说，我的“善著书”，强调的也是自己思想的严谨认真。

从为人角度看，太史公笔下的“口吃”“不能道说”者是一个办事认真、说话算数的群体。这一群体实际上是与“滔滔以言”“虚言惑众”者形成鲜明对比的。郭解，汉初大侠，“（其人）状貌不及中人，言语不足采者”，这是种为人。李广，是驰名中华大地的“飞将军”，“其人悛悛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辞”，这也是种为人。苏建，号为“游击将军”，其人亦“口不能言”，这也是种为人。把我韩非纳入“口吃”“口不能言”这样一个为人作风的群体，是我的光荣。这种“为人”作风的特点是：讲的少，做的多；不讲空道理，脚踏实地地干实事、读书、做学问。



《史记》书影



李广墓

李广，西汉名将。武帝即位，召为中央宫卫尉。不善道说，勇战有谋，抗击匈奴，屡立战功，匈奴畏服，称之为“飞将军”，数年不敢来犯。